

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臺灣社會

許佩賢

摘 要

本文透過考察日治中期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

1920年代以後，學校體系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臺灣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預想是，大部分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但是對選擇接受新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兩者之間出現了相當的落差。

公學校教育為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20%的人日後得以脫離農業等依靠勞力的傳統生業。臺灣社會逐漸認識到，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

雖然整個日治時期，自公學校畢業的人還不是多數，但是他們對自己所受的新教育抱著自豪感。他們之中有人繼續升學，甚至留學，成為知識菁英；更大多數的人雖然沒有繼續升學，但他們充分發揮公學校所學習的知識、能力，或善用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在社會上活躍。這些沒有繼續升學的公學校畢業生，提供我們重新思考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

關鍵詞：就職、公學校畢業生、學歷社會

Common School Graduates and Taiwanese Society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Pei-hsien Hsu^{*}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evaluate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under the Japanese rule by examining social status and activities of common school graduates during the middle period of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as upgraded after the 1920s to allow common school graduates to work immediately after graduation. However, for many Taiwanese who intended to transform their former social status from farmers this new educational system offer was not their first choice. The common school education provided the graduates different with career opportunities. At least 20% of the graduates from rural villages were able to break away from the traditional means of livelihood relying solely on labor, such as agriculture. Taiwanese people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a diploma represented a certification of one's ability. Taiwanese children who had a desire for education would strive to enter a modern school. They saw common schools as a foundation either for acquiring the qualification for entering higher education or for exploring other non-conventional possibilities of learning in order to exp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Although the number of common school graduates was not high during the whole Japanese occupational period, they were proud of their education. Some of them continued to study, sometimes even went abroad, and eventually became social elites. The majority, who did not enter higher education, nonetheless became active members in society by making the best use of the knowledge they had learned in common schools or by capitalizing their diplomas. Through studying these common school graduates who did not receive higher education, we will be able to understand the social meaning of the new educational system under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Keywords: finding employment, common school graduates, society of diplomas

^{*}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日治中期的公學校畢業生與臺灣社會*

許佩賢**

壹、前言

日本統治臺灣之初，即引進近代學校體系，以便培養能配合殖民統治的新人民。日治前期的教育以初等教育為主，初等教育之後只有少數職業教育機關；1922（大正11）年新「臺灣教育令」頒布後，臺灣逐漸建立起與日本內地相仿、由小學到大學的升學體系。1945年日本統治結束前，臺灣有帝國大學、高等學校各1所，專門學校5所，學生共3,800餘人，其中臺灣人學生僅750餘人；師範學校3所，學生2,800餘人，其中臺灣人學生520餘人。中等階段的學校有中學校與高等女學校各22所，學生28,000餘人，其中臺灣人12,000餘人；實業學校27所，學生14,000餘人，臺灣人9,100餘人；國民學校1,099所，學生932,000餘人，其中九成五是臺灣人。¹由上述數據可見，臺灣人能在臺灣接受的高等教育相當有限，中等教育階段的日、臺人數

* 本文初稿曾於2009年12月發表於臺灣大學歷史系主辦「臺灣與海洋亞洲」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承蒙評論人林蘭芳教授及在場先進的指正，謹此致謝。本文為國科會計畫「日治時期公學校畢業的社會史意義」（計畫編號NSC 101-2410-H-003 -011）成果之一部分。本文承蒙二位匿名審查人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特此感謝。

收稿日期：2014年1月20日；通過刊登日期：2014年4月30日。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副教授

¹ 以上均為1944年4月之統計，根據臺灣總督府的官方文書，高等學校屬於高等教育，因此高等學校尋常科人數也併入高等教育人數。初等教育階段完成後的升學機關，除中學校、高女及實業學校之外，還有實業補習學校，在日治時期的公文書中，實業補習學校並不被納入中等教育機關，因此，此處暫不放入中等教育統計。但事實上，日本統治的最後幾年，實業補習學校才是收容最多初等教育以上的臺灣人的教育機關，1944年時有實業補習學校90所，學生18,000餘人，其中臺灣人15,000餘人。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年），頁44-50。

雖然較為相近，但是對總人口數占絕對多數的臺灣人來說，中等教育無疑也是相當高的門檻。從就學人數來看，日本時代所建立的教育體系中，初等教育階段的公學校可以說是臺灣人最重要的近代教育機關。

以往的研究已經指出，殖民時期的新教育為臺灣社會帶來很大的改變，臺灣的舊社會領導階層讓其子弟接受新式教育，甚至送到日本留學，因而得以繼承或取代其父兄的社會領導地位。根據吳文星的研究，1910 年代，社會領導階層中有 48% 受漢學教育，53% 受公學校、中學、師範、醫學或留學等新式教育；到 1930 年代，受漢學的社會領導階層約占 24%，受新式教育者約占 64%；到 1940 年代前期，漢學出身者僅餘 4%，受新式教育者占 84%。從這個比例變化，可以清楚看到新、舊教育優位性的改變。而同樣是受新式教育的人中，公學校程度者的比例 3 個年代皆約占 10% 左右；1920 年代中等以上教育尚未開放之前，醫學校與國語學校是臺灣人最重要的兩個升學管道，在各個年代所占的比例合計皆約 30%；升上中等學校，或之後不論在臺灣或是留學繼續就讀專門學校或大學者，在 1910 年代僅占 3%，1930 年代占 24%，到 1940 年代占 41%。由此可知，在新式教育中，最大的變化其實是中學校、專門學校及留學生（專門學校及大學）的比例。因此，吳文星指出「受過高等教育的留學生日漸成為社會領導階層的重心」。²

這樣的觀察，確實精準的指出日治時期新教育的社會意義，但是筆者在意的是在這個新教育體系中，只接受初等階段的公學校教育，並沒有或不能往上升學的大多數受新教育者，他們在社會上扮演的角色如何，「公學校畢業」的學歷是不是能為他們帶來社會移動的可能性，並以此討論「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在日治時期臺灣社會的意義。關於時期的設定，考慮到日治前期，就學率不到三成，能畢業者更少，其意義應與就學率逐漸普及的 1920 年代以後有所不同。而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發布以後，有了上級升學機關，公學校成為升學系統中的第一階段；1930 年代後半進入戰爭時期以後，為了因應戰爭，教育政策方向及社會上有很多變化，因此，本文擬以 1922 年以後至 1930 年代後半戰爭開始之前為中心進行討論，視情況需要也會提及其前後時期。

²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 年），頁 152、154、156、157。

貳、數字會說話：從統計數字看公學校畢業生

在許多回憶錄或訪談紀錄中，常常看到很多人提到他們公學校畢業後想繼續升學，可是家裡很窮，家長不同意，只好忍痛放棄；有些人則因考不上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或是考慮到中學校或高等女學校學費太貴，退而求其次，轉而就讀職業學校。究竟公學校畢業生畢業之後都到哪裡去了呢？有多少人升學、多少人就業？不同學校的升學情況如何？不同業種的職工其學歷分布狀況如何呢？得以升學的人，自然掌握了社會上升重要的通行證，然而那些沒有辦法繼續升學的人，僅憑著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能不能成為社會上升的通行證呢？他們的學歷有沒有什麼樣的效用呢？

要了解這個問題，我們可以試著利用官公廳統計書中對公學校畢業生的出路調查來考察。一方面是由於資料的限制，一方面也鑑於較小的地域社會比較能具體地掌握人事資料，因此以下擬以宜蘭地區的材料為中心考察此問題。

宜蘭地區在 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以後，隸屬於臺北州，分成宜蘭郡、羅東郡、蘇澳郡 3 郡，本節主要考察宜蘭市街所在的宜蘭郡。

臺北州自 1926 年出版《臺北州第一統計書》，收錄的是 1924 年的數據。這些數據是該年度學生畢業（3 月）後，於年底所做的調查，因此可以提供我們公學校畢業生畢業後不久的情形，至於畢業後 1、2 年，甚或 3、5 年之後的情形，就無法從這份資料中得知。1924 年度的統計，分成升學及就業兩類，其中升學又分成島內及島外，就業則分成「從事實業者」、「官廳或公職者」、「任學校教員者」及「在銀行會社就職者」4 種。資料可以上溯到 1920 年度，惟 1920-1923 年僅有全臺北州的統計，1924 年起有州下各市郡的數字。該年度統計並沒有包括所有畢業生，被列入升學或就業的人大約僅占所有畢業生的三分之一，其餘未計入的人數應該是從事不在上述「職業」，例如從事農業或留在自家幫忙的人。

自 1925 年度的《第二統計書》起，公學校兒童畢業後情形調查項目分得比較細。升學部分分成「修習上級教科者」及「升入上級學校者」，前者是指升上公學校高等科者，後者是升上其他中等以上學校者。除了升學者之外，還有「有職者」及「其他」兩類統計，「有職者」分為「農業」、「水產業」、「礦業」、「工業」、「商業」、「交通業」、

「公務及自由業」、「其他有業者」、「家事使用人」、「有收入者」；³ 「其他」則包括「無職者及職業不詳者」、「死亡者」。如此則將所有畢業生統計在內，也就是包括了升學、就職及從事各種傳統生業者。⁴ 此後一直到 1941 年最後一本《臺北州統計書》，大抵皆按此分類統計。附表 1 為宜蘭郡公學校兒童畢業後狀況統計一覽。統計書中，1933 年以後，「交通業」沒有獨立項目，變成「銀行會社員」，而「公務自由業」變成「官公吏雇傭人」。原先的「銀行會社員」應該不等同於「交通業」，而「公務自由業」的範圍也比「官公吏雇傭人」的範圍大，「自由業」應該包括醫生、律師、畫家等在內。不過為求統計表格易讀，僅在表格中附註，直接將欄目改變，不另設新欄目。從附表 1 的統計，可以觀察到幾個現象。

一、1920 年代中期以後，雖然中高等教育的學校體系完備，但是從公學校升上中等學校的人數還是相當有限。歷年來，宜蘭郡公學校畢業生升上中等學校的比例，一直沒有超過 10%，大部分是在 3-6%之間，人數也非常少。對地方上的人來說，如果要升學，顯然公學校高等科是最有可能的選擇，從宜蘭郡公學校畢業生就讀高等科的比例來看，1935 年以前約在 10-20%之間，1936 年以後提升到 20%以上，1938 年以後的數字則超過 30%。

二、大部分的公學校畢業生還是在畢業之後即立刻就業，也就是就學者中大部分的人是以公學校為最高學歷。在就業的人當中，以勞力工作為主的占最大多數。商業、交通業、銀行會社員、公務自由業人數雖然相對較少，但是 6 年公學校畢業後，可以脫離靠勞力生活成為薪水階級，應該是最能凸顯公學校學歷有效性的一群人。此外，「家事使用人」（家庭幫傭）的人數不少，也頗值得注目。

從這些統計數字可以觀察到以上的大方向，我們可以從另外一份資料將這些統計

³ 「有收入者」意義不是很明確，但這一項目人數極少，且於翌年以後就沒有統計，因此在附表 1 中併入「其他有業者」統計。

⁴ 日本學者佐藤（粒來）香以「生業」與「職業」來區分日本近代化前後不同的生計活動，「生業」包括農業等工作，而「職業」是工業化以後所出現的工作，當然也存在混合性。她主張在近代日本的觀念中，從事生業的人通常被認為不如從事職業的人（被雇傭者，即所謂白領階級），佐藤從這裡看到近代日本社會從「生業的世界」往「職業的世界」轉換。見佐藤（粒來）香，《社会移動の歴史社会学——生業／職業／学校》（東京：東洋館出版社，2004 年）。此處雖然不探討從事傳統職業（生業）或就職新行業（職業）的問題，但是這樣的討論也提供我們思考殖民地時期的臺灣是不是也存在這種上升志向。

數字具象化。

宜蘭公學校於 1939 年舉行開校 40 週年的紀念活動，之後出版專刊，其中調查了歷屆畢業校友的住所、現職。⁵ 我們將這一份資料與統計書中的數字相互參照，可以對於統計數據中顯現的傾向有更具體的認識。

這樣一份定時性的資料，有很多限制。首先，以 1939 年這一年來看，5 年內剛從學校畢業的學生，尤其是 1、2 年內的畢業生，有很大的比例繼續升學，其中絕大部分是進入公學校高等科就讀。然而 1934 年以前畢業者，則很難確認其升學狀況，若是就讀同校高等科，其高等科學歷尚可確認；若是其他中等以上學校，則未必能一一確認。他們是不是取得更高學歷之後才能從事這項工作，在這份資料中也看不出來。其次，在登錄畢業校友目前的職業時，有些僅寫「被雇」，至於被什麼單位雇用，無法確認。最後，對一個生活在 1920 年代或 1930 年代的臺灣人，在離開學校出社會後，換工作或是換謀生的方式，應該不是少見的情況，如我們所熟知的公學校教師，有很多人工作數年之後即轉換跑道，或到日本留學深造。如果是家裡有田地或家業，為了繼承家業，也許從 15 歲以後的生業方式都一樣也有可能。總之，我們現在只能看到 1939 年時這些不同年代出生、不同年代自公學校畢業不同年紀的人，在 1939 年時的職業分布。儘管有這些限制，這仍然是少數幫助我們瞭解「公學校畢業」這個學歷，在不同時期可能透露的社會意義。以下，配合其他的統計資料，先來看看不同年代公學校畢業生的職業分布情形。

參考前引《臺北州統計書》的職業分類，將各人職業分成以下 11 類來標記（如表 1），其中不免有難以判斷者，但是仍可根據以下分類表瞭解公學校畢業生職業分布的概況。

我們從宜蘭公學校設高等科的 1922 年開始，每隔 4 年觀察畢業生的職業分布（如表 2）。由於資料的限制，分類或標記很可能有許多誤差，因此，本文不擬計算各職種的百分比，僅從大致的分布狀況來考察。

⁵ 宜蘭公學校，《臺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周年紀念誌》（臺北：宜蘭公學校，1939 年）。

表 1、宜蘭公學校歷屆畢業生職業分布分類表

標記	類 別	細 目
A	官公吏及自由業	任職於官、公廳、學校、醫師、律師
B	公司、銀行	店員、運轉手、會社員
C	工、礦、漁業	木工、職工、營造業
D	商業、自營商、自己開店	料理業、理髮業、實業
E	被雇用	
F	日傭	
G	農業、種田	
H	地主	
I	自宅、家事	
J	升學	
K	死亡、不明	

資料來源：參考各年度《臺北州統計書》，及宜蘭公學校，《臺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周年紀念誌》，畢業生一覽表；作者製表。

表 2、宜蘭公學校畢業生職業分布表

年代 職業	A	B	C	D	E	F	G	H	I	J	K	計
	官公吏及自由業	公司、銀行	工、礦、漁業	商業、自營商、自己開店	被雇用	日傭	農業、種田	地主	自宅、家事	升學	死亡、不明	
1922	15	12	4	24	0	0	0	8	0	0	20	83
1926	16	15	5	40	2	1	10	7	0	0	46	142
1930	13	22	11	39	0	6	2	12	5	0	2	141
1934	9	33	13	26	0	2	3	0	0	18	21	125
1938	2	28	5	10	0	5	5	2	0	87	28	172

資料來源：宜蘭公學校，《臺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周年紀念誌》，頁 63-116；作者製表。

這幾個年代，除了 1938 年剛畢業的學生，有一大半都在就讀高等科之外，以從事各種商業者最多。從登記的職業中，例如「吳服商」，從字面上看應該就是開了一間布店，而不是在布店工作，如果是受雇於布店，有些會寫「店員」，或是「某某店雇」。可以被歸入廣義的「商業」的有米穀商、藥種商、吳服商、雜貨商、材木商、

古物商、鐘錶商、履物商、獸肉商等。可能因為是在宜蘭街上，從事農業者反而不多，而是以上述各種商家最多。除此之外，很引人注目的是官公吏以及受雇於醫院、公司行號或商店的店員、會社員、技術人員（如司機）等也不在少數。

1922年畢業的學生，如果以7歲入學計，1939年時約30歲。雖然，在1910年代之前，公學校學生超齡入學的情形還相當普遍，但應該不致於對推論有重大的影響。1926年畢業的學生，1939年約26歲；1930年畢業的學生，1939年約22歲；1934年畢業的學生，1939年約18歲。因此，表2大約是宜蘭街上公學校畢業、20-30歲左右青年的職業分布。此時所登錄的職業，自然有可能是幾度轉職後的結果，也有可能是取得更高學歷之後的工作，如此則必須一一追跡每個個人的生活史，方可確認。然若是1930年代以後的資料，可能比較容易確認，特別是1934年以後的畢業生，若是往上級學校升學，除非是就讀高等科，2年可以畢業，若是其他實業學校、中學校等，大概到1938年都還在學中，高等科入學者可以由同一份資料的高等科畢業生中確認，其餘在工作者，應該就是公學校畢業後立刻踏入職場的人。我們追跡這些人的職業分布，正好可以觀察1930年代中期公學校畢業生的出路。

1934年畢業的125位學生中，有25位兩年後自高等科畢業，其中16位就業（4名不詳），有4位經高等科繼續升學。也有可能進高等科1年後中退便升上上級學校，但在資料中無法顯現出來。但同年並沒有人晚1年自高等科畢業，顯示如果畢業當年沒有升上高等科，大概也沒有「重考」高等科的情況。以1934年高等科畢業生來看，這一年有44名高等科畢業生，畢業4年後，7名在官公廳任職，7名受雇於公司行號，10名升學，4名從商，4名貸地業，2名農業，1名工業，9名不詳。高等科畢業後，在升學或就業上較占有優勢。1938年172名畢業生中，有超過一半的87名學生繼續升學，87名中，1位就讀宜蘭農業學校、2位就讀中學校，其他皆進入高等科就讀。宜蘭公學校的高等科自1922年開設，每年招收2班，這一年有170名學生入學，自宜蘭公學校本科畢業的大約一半。

在官公廳工作的公學校畢業生，1934年畢業者有9人，1935年畢業者有8人，1936年畢業者有6人，1937年畢業者有17人，包括就職於街庄役場、火車站，或是擔任保甲書記或公學校職員等。其次，店員、會社員也有不少。1938年172名畢業生中，除了上述近半數升上高等科之外，27名受雇為店員，也是很高的比例。在官公廳工作或是受雇於商店、擔任店員，自然有各式各樣的可能性，也有可能還是以

勞力為主的工作，不過基本上應該可以算是薪水階級。

為了瞭解公學校畢業是否有可能讓農漁礦工子弟脫離傳統生業，再將職業分成傳統依靠勞力為主的工作以及受薪階級的白領工作，可將表 2 再進一步化約為表 3。

表 3、宜蘭公學校畢業生升學及各類職業比例表

年代 職業	升學 高等科及上級學校 ()內為高等科	傳統生業 農、水產、礦、工業	受薪工作 商業、銀行會社員、 官公吏約聘雇	其他 其他有業者、家事使 用人、無職、不詳、 死亡
1926	14% (9%)	42%	22%	22%
1930	19% (12%)	34%	20%	27%
1934	22% (16%)	34%	20%	24%
1938	26% (20%)	32%	22%	20%

資料來源：宜蘭公學校，《臺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周年紀念誌》，頁 63-116；作者製表。

由表 3 來看，「受薪工作」的比例沒有太大的變化，一直在 20%左右，表示透過公學校教育成為薪水階級的人一直有一定的比例。傳統的農、漁、礦業部分，從 1920-1930 年代有一個很大的落差，但在 1930 年代大約維持一定的比例。最能明顯看出變化的是升學比例持續上升，其中的改變主要來自高等科的就學。扣除掉高等科的升學比，在 5-7%之間，雖然高等科一般不被視為中等教育升學機關，卻是大部分公學校畢業生可以變成和一般公學校畢業生不同的機會，而公學校畢業的學歷，便是保證可以升上高等科的資格。

總的來說，公學校畢業生雖然在學齡兒童中人數很少，⁶ 但這些少數的公學校畢業生，除了取得可以升上上級學校的學歷資格外，也比一般沒有就讀公學校者有比較多的機會成為農村或城鎮上的受薪階級。

⁶ 根據 1934 年的統計，宜蘭郡有學齡兒童 15,000 餘人，就學率 39%，修畢公學校課程者僅 656 人。見《昭和九年 臺北州統計書》（臺北：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1936 年），頁 52-53。

叁、1930 年代的公學校畢業生：以澎湖洪四川為例

本節擬以一位 1930 年代自公學校畢業，沒有繼續升學的人物為例，從他的生活經歷，考察當時人們如何思考進入公學校就讀、公學校畢業後的出路以及自己的未來。

本文選定的人物是 1920 年出生在澎湖縣湖西鄉隘門村（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時隸屬於澎湖郡湖西庄）的洪四川。⁷ 隘門村靠海，距離馬公市區走路約 2 小時，四川祖父曾以行走貨船為生，但很年輕就過世，不久祖母也過世，父親在 1890 年出生，本來有機會可以讀書的，然因家中貧困，沒有受教育，也因為不識字，受族人欺負，祖產被侵占。四川自幼即常聽父親提起這段困苦往事，下定決心以後要出人頭地。

四川出生後，父親一面從事澎湖最常見的捕魚工作，家裡也有幾分薄田，可以種些雜糧；此外，父親也是個打石師傅，冬天和村裡的男人們一起到臺灣打零工，春天一到再回澎湖。但是，即使如此勤奮努力，也很難養活一大家子。

父親認為男孩子應該認點字，在四川 7 歲時送他到村裡的書房讀漢文。當時已經有公學校，父親見鄰家小孩都 9、10 歲才上公學校，認為大一點再去讀公學校即可，以免被大孩子欺負。但是，對幼年的四川來說，公學校老師是全村最吸引他注目的對象，老師的制服筆直耀眼，夏天是白色，冬天是藍色，鑲金線、按金扣，是全世界最漂亮的衣服。而穿著整齊文官制服的老師，象徵著知識與富足，因此他非常嚮往到公學校讀書。9 歲時，老師來村裡拜訪家長招生，他擅自拿了父親的印章蓋了章，跟老師登記要上公學校，父親也拿他沒辦法。1928 年，四川進入湖西第一公學校隘門分教場就讀，但下午仍到書房繼續讀漢文。日治前期許多臺灣家長，一方面受到新式教育的吸引，或是被勸誘，不得不將子弟送到公學校就學，但另一方面仍然認為傳統書房所傳授的四書五經才是真正的學問，因此讓孩子早上到公學校讀書，下午到書房讀漢文。從洪四川的例子可以看到，在澎湖，甚至到了 1920 年代後期，早上去公學校讀日本書，下午到書房讀漢文，還是很普遍的現象。

⁷ 由於資料限制，無法延續前節討論，使用宜蘭地區的例子；但是澎湖在 1895 年以後的發展，與臺灣本島有很類似的地方，作為一個農漁村發展的例子，仍然有其有效性。

洪四川讀的書房叫訓蒙軒，是當地 3 代秀才、族親洪庭華所開設的書房。四川在這裡讀了 3 年，念完《三字經》及《四書》，因書房停辦才停止。沒上書房後，四川仍繼續自習漢文、毛筆手抄古書，求知若渴。隔年，另一位老師繼續開辦訓蒙軒書房，四川又去讀了 3 年，念完《尺牘》、《瓊林》及《詩經》。甚至在公學校畢業後，因為父親沒錢讓他讀高等科，而漢文書房收費較便宜，因此，他又回到書房再念了一段時間。因為村裡認識字的人不多，像洪四川這樣念了幾年漢文書，也練過書法，過年時便可以幫村裡人寫春聯，有時也可以得到一些回報，是他幼時最喜歡的事情之一。

公學校求學期間，四川表現都很好，老師對他印象很好，尤其六年級時的高老師（高振坤），鼓勵他一定要念高等科。1934 年四川以第二名畢業，他雖然想繼續升學高等科，但家裡說經濟不好，沒有辦法讓他升學，因此感到非常失望。畢業後，家裡覺得他年紀還小，還不能出去工作賺錢，遂讓他再去書房讀漢文。不久，公學校的老師介紹他到馬公街上的捷興百貨店當童工。

捷興百貨店就在澎湖醫院對面，店裡賣生活用品、衣服、鞋子、化妝品等，讓四川見識到「文明」，大開眼界。百貨行一星期工作 7 天，沒有休假，童工的工作就是一大早起床，打掃店面，整理架上貨品，此時 15、16 歲的四川，已經相當懂事，店裡不論什麼事，他都勤快去做。老板見他做事勤快，又懂漢文，也願意多教他一些，不久後，店裡的記帳、收帳，都由四川負責，他也注意觀察學習，因此了解公司營運道理。

四川雖然念完 6 年公學校，但其實日文並沒有學得很好，倒是在店裡幫忙，因為有很多日本人顧客，因此有機會練習日文；在馬公也可以借到一些日本文史刊物和小說，日文便漸漸熟練。雖然工作很順利，但四川對於沒能繼續升學，一直耿耿於懷，認為沒得念書，差人一等，因此要更加倍努力。一次在老板家中意外發現了日本早稻田中學函授講義，便拿來自修。此時才發現，幼時訓蒙軒漢學堂紮實的漢文基礎，真正幫助了後來自修日文。

在百貨店工作，他學會記帳、收帳、買賣訂貨和待客應對的道理。剛開始 1 個月薪資有 2、3 圓，他都寄回家去，對家裡有很大幫助。過了兩年，他的薪水升到 1 個月 7、8 圓，已經是不錯的收入，但他開始思考未來的發展。他想再繼續做下去，只能永遠當店員，他希望能有自己的事業。有一次聽到老板娘的妹妹，在臺灣做撞球店

計分小姐，一個月有 16 元，他非常羨慕，決心要到臺灣。

對澎湖人來說，臺灣是文明的所在，賺錢的好地方。澎湖有一句俗話：「有賺沒賺吃一漢」，意思是到臺灣，就算沒賺到錢，吃飯也吃得比較好，有白米飯可吃，至少可以養活自己。四川決定到臺灣打拼，準備離職前，他把所有和百貨店有來往的店家聯絡資訊抄下來，以備不時之需。離開澎湖時，他就只帶著公學校畢業證書和店家資料，坐船來到高雄，投靠姊夫。這是 1936 年的事。

來高雄之前，他已經寄了履歷表給姊夫，請姊夫幫忙留意工作。姊夫也拜託朋友幫忙，但都沒有著落。每天一早，四川就到高雄港碼頭、鼓山附近，大街小巷沿街尋覓，看看是否有人張貼徵人啟事。一早出門、晚晚回來，幾個月都沒有結果。後來找到一家日本人開的腳踏車店，幫忙擦腳踏車。腳踏車店老板包攬到很多生意，每兩天派人擦一次，按月收取維護費。小伙計 3 或 4 人一組，提著擦腳踏車的工具箱，沿著高雄市區，一家接一家的擦。做了 4 個月後，四川認為這個工作繼續做下去，頂多只能開一家腳踏車店，實非長久之計，便辭職另謀他就。不久後，經人介紹進入一家建築師事務所工作。

洪四川認為像自己這樣沒有家世背景的人，由澎湖僻壤小村來到大都市高雄，如果有好的學歷文憑，別人也比較容易給你工作機會，才能有發揮自己的舞臺，不然連工作都找不到。因此，他白天在建築師事務所工作，晚上則到高雄建築技術練習生養成所上夜校。後來也參加大阪工業技術專門學校建築科及東京高等工業學校函授課程，日後進入營造業，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⁸

這個故事很值得我們思考 1930 年代公學校教育在社會上的位置。洪四川在澎湖的鄉下成長，他入學公學校的 1928 年，澎湖學齡兒童男生就學率是 48.46%，⁹ 幾乎每兩位男生就有 1 名就學，甚至比全臺灣的平均數值（44.68%）更高。而且在他所住的隘門村就設有公學校的分校，因此對四川來說，可以到公學校就讀，應該不算太困難的事情。此時日本統治已經過了 30 多年，家長也沒有反對讀日本書的意思，甚至覺得不識字會帶來生活上的不方便，會受人欺侮，因此也有送子弟去讀公學校的意

⁸ 洪四川，《八十四述——洪四川自傳》（高雄：洪四川文教公益基金會，2001 年）。

⁹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七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1 年），頁 84-85。

願，尤其是男生。如果是女生，就幾乎沒有機會入學，同樣這一年澎湖女子學童的就學率只有 6.79%。¹⁰ 只不過家長對於 6 歲入學這種近代學校的規定，並沒有認真當一回事。

洪四川的父親認為讀書最優先的選擇還是傳統書房。這一年澎湖廳還有 19 間書房，學生人數約 500 名。¹¹ 但是，在兒童眼中，有著漂亮建築的公學校以及穿著文官制服的公學校教師便是知識、財富與文明的象徵。對公學校教師制服的嚮往，在楊肇嘉、吳濁流等人的回憶錄中都出現過，可見公學校教師的文官制服，確實帶有宣示文明權威的效果。洪四川受到教師制服吸引，自己想辦法入學，其間都表現很好，自己也很樂於學習，所以即使如願進入公學校就讀，每天下午仍然到書房繼續漢文的學習。書房教育雖然以漢文、書法等為主，但洪四川認為在書房學習漢文的紮實基礎，對他後來自修日文也有很大的幫助。

如同下節所顯示的，很多臺灣學生讀了 6 年公學校，日文並沒有真正學好，學校畢業後，也沒有機會使用，很快就忘記。洪四川也有這樣的問題，他認為自己雖然自公學校畢業，但日文並不能自在地使用，後來因為工作上有機會接觸日文，加上努力自修，之後才慢慢熟練。

1934 年，洪四川公學校畢業。這一年全臺灣從公學校畢業的學生約有 35,000 人，但澎湖只有 453 人。¹² 此時澎湖只有馬公第一公學校設有兩班高等科，這一年澎湖的公學校畢業生，有 42 人升上高等科繼續就讀，沒有人升學中學校和高等女學校，有 1 人升學農業學校，還有 21 人升學實業補習學校。¹³ 從數字上看，此時在澎湖地區，雖然學齡兒童就讀公學校的比例比全臺灣平均更高一些，但和前節所示的宜蘭郡比起來，公學校畢業後繼續升學的人則相當有限。

洪四川自己有很強烈的求學意願，想繼續念書，但他也明白不可能奢望到臺灣本島去升學，只希望能在澎湖本地的高等科升學。回憶錄中說父親認為四川從公學校畢

¹⁰ 此年全島學齡女童就學率為 13.8%。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七年報》，頁 84-85。

¹¹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七年報》，頁 422-423。

¹²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三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6 年），頁 102。

¹³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三年報》，頁 132、133。

業年紀還小，也不能去賺錢，顯然家裡雖然貧困，但也並不是需要他立刻去工作賺錢，然而念高等科還是需要學雜費等，家裡無法供應，因此決定讓他去學費較便宜的漢文書房。

公學校畢業後沒多久，學校老師介紹他到馬公市街上工作，四川這個時候大約是 15 歲左右。15 歲，對現在的我們來說還很小，還不是可以出去工作賺錢的年紀，回憶錄中也說自己去當童工。不過，當時報紙上的徵人廣告，徵求 14、15 歲小弟的廣告不少，應該也不是太稀奇的事。

在馬公街上的百貨店工作了 2 年，四川決定渡海到臺灣本島打拼。他覺得自己沒學歷、沒人脈，很難有機會。不過，他還是把僅有的學歷證明——公學校畢業證書，當做開創未來前途的門票，小心翼翼地帶到臺灣來。後來也靠著這個學歷，才得以進入相當於實業補習學校的高雄建築技術練習生養成所修業，也才能透過函授，接受專門學校課程。

像洪四川這樣的人，只有公學校畢業，在日治時期，一般不會被認為是菁英分子，他自己也認為書讀得不多。然而他之所以得以在日後有所發展，不得不說是基於公學校的基礎教育。他可以在百貨店擔任店員，固然是基於書房學習的漢文根基，但在公學校學習的日文，雖然不夠熟練，也能應對日本客人，在接待客人的過程中慢慢熟練。而公學校畢業的學歷資格，也成為他日後得以繼續進修的入門票。

其實，不只是洪四川，從目前已經出版的口述訪談或是回憶性質的文字，也可以找到不少類似的例子。例如作家鄭鴻生的母親施傳月，公學校畢業後，在家裡的雜貨店幫忙時，意外發現包東西的字紙中，有日本婦女雜誌的洋裁教學。因為讀過公學校，懂得簡單的日文，公學校的家政課也學過基礎的裁縫。她便靠著婦女雜誌自學洋裁，先在家幫人做簡單裁縫，後來到洋裁公司工作，看到有洋裁師傅到日本學習洋裁設計，從來沒離開過臺南的她，也請人幫她買了車票、船票，到東京去學習洋裁，回臺後自己開設洋裁補習班，一直持續到戰後。像這樣的例子，與洪四川有類似之處，他們在當時都稱不上菁英分子，但是靠著他們的公學校學力以及學歷，為自己開拓了一片天。¹⁴

¹⁴ 參考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印刻出版社，2010 年）。

由洪四川的故事，我們看到 1930 年代前後，臺灣社會對進入公學校及公學校畢業後進路的考量；以及 1 名公學校畢業生，憑藉公學校畢業的學歷，可以做的選擇。雖然只是一個個案，卻提供我們很好的具體例證。

肆、公學校畢業生的鏡像

日本在臺灣引進近代學校，自然有其統治目的，然而臺灣社會之所以接受近代學校，也有自己的如意算盤，如同折射鏡一般，映照出不同的鏡像。

對教育關係者來說，把兒童、青年集中在學校，根據一定的作息，施以設計規劃好的一套教育，是最能確保兒童、青年不脫離政府規範的有效方法。學生一旦畢業，如何確保在學校中的規訓能持續有效，便成為教育關係者關心的重點，所謂「卒業生指導」或是 1920、30 年代以後的青年團、青年學校等制度，基本上都是在這樣想法的延長線上。另一方面，對於臺灣民眾來說，隨著日本統治而建立起來的近代學校，並不是傳統社會文化中固有的組織。日治初期，臺灣人曾經對學校要上體育課、音樂課感到困惑，這也表現了新舊教育觀的衝突。然而，由於統治初期迫切需要基層的行政、通譯人員，因此，短期（半年或 1 年）就學之後，要在公家機關謀得一官半職並不是太困難的事，看在窘於生計的民眾眼中，學校不僅是新科舉，甚至是一步登天的天梯，因此而將子弟送入學校的也有不少。隨著行政末端人才的補足，學校不再是立刻見效的社會上升管道後，就學人數仍然持續增加。此時把孩子送到學校的家長，有可能是受到學校所代理之新文明的吸引，也有可能是因為傳統文化中對學問知識的尊重，也有可能只是因為教師或地方社會的學務委員勸說的人情壓力，但是無論如何，他們對學校教育（學歷）的社會或經濟效用還是有某種期待。

我們家很窮，所以沒辦法讓弟弟讀書。而且去年畢業的哥哥，沒有工作，現在在放水牛，不能去做什麼賺錢的工作，花了錢和時間，只是讓我們操心，實在沒有必要把他們送去學校。

務農、放牛，不懂國語也可以，又不是為了放牛才到學校。農業的話，

只要像父親那樣做就可以。¹⁵

這是 1930 年代前後，一位農家母親的心聲。

對一個普通農家來說，決定要不要送孩子去學校讀書，關鍵在於家長對學校教育的認知與期待。從這位母親的話中，我們看到她對學校教育的失望。因為學校教育（學歷）並沒有為子弟帶來看得到的社會或經濟效用。然而，另一方面，我們看到即使像這樣貧窮的農家，也願意試著將長子送到學校去讀書，還讓他讀到畢業，其實也反映了在這種失望的背面，某種對學校（學歷）的期待，期望著學校教育（學歷）能帶來更好生計方式的可能性。

留下這份紀錄的是一位公學校教師，這是他到農家去勸誘入學時家長的回應。公學校教師的立場，自然與期待學歷效用的母親不同，他並不關心臺灣農家希望子弟有機會脫離農業生活的心情，而是站在教化的立場來看公學校教育。他向家長鼓吹：「（到學校去）學了大家都不知道的國語和其他知識，可以變成更好的人。」但其實重點並不在提升個人知識品德（「更好的人」），而是象徵日本精神教育骨髓的國語教育。這位教師接著說：

懂國語是絕對必要的。因為大家都不懂國語，所以一般都講臺灣話，等到變成國語的臺灣，就是要使用國語的時代了。懂國語的人到鎮上辦事的話，某種程度也可以做得來。沒有受學校教育的話，很難變成社會人。畢業後立刻有用賺錢是沒辦法。以前公學校畢業生少的時代或許可以也不一定，但像現在如果不是中等學校以上畢業就沒辦法。但是，不懂得一般社會人的常識，已經是很丟臉的現在，如果不是公學校畢業生，作為社會人，作為農村民都做不來的時代早晚會來。喔，不，其實已經來了。因此至少要公學校畢業，否則，將來沒有用。現在不到學校，在家裡放牛養豬，雖然可以幫點忙，但以後朋友們都變成了不起的農民，那（孩子）不是很可憐嗎？而且一樣是放牛，一樣是幫忙農事，有到學校和沒到學校的人完全不同……（到學校的話），可以應用學理，改良舊有習慣，……而且大家都想到鎮上領薪水，那農村就沒有年輕人，沒有有希望者，農村就會疲弊，好的農民應該務農，讓村子發展。（底線為筆者所畫）

¹⁵ 卍生，〈公學校卒業生と社會環境（二）〉，《第一教育》，第9期（1929年10月），頁7-13。

從上面這段話，可以看到教育關係者對公學校教育的期待。他們把公學校教育視為社會人基本的教養，強調國語能力及社會常識，特別是期待兒童受過教育之後可以成為有科學知識的農民。事實上，這也是殖民政府要透過教育改造被殖民者的最重要課題。對一般民眾來說，把子弟送到學校去讀書，期待子弟可以在畢業後能因為受教育而找到一份可以賺錢的工作。這種社會期待，即使是到公學校就讀的兒童，也多少感受得到，或是自己也十分接受吧。

受公學校教育的人如何看待自己所受的教育？我們可以從當時的相關紀錄、回憶錄或訪談記錄中來觀察。大體說來，特別是在農村地區，受過新教育的人對自己所受的教育引以為傲——即使只是公學校階段的教育。但是這種心情表現在外，就變成受到教育當局或教育關係者指責的一種現象。教師們批評公學校畢業生，「說著半調子的國語，在街上晃來晃去」，「醉心於公學校畢業生這種半調子的虛榮摩登氣氛」，自以為是「高級青年」。¹⁶「他們好像覺得自己受了六年初等教育，就好像從大學、專門學校出來一樣神氣。」但其實「不會寫信，連報紙雜誌也不能讀，不能成為領薪水的人，不能輕鬆賺錢，而又討厭流汗身體勞動，什麼工作都沒有，只好整天遊手好閒。」¹⁷雖然是日本人教育關係者的批評，但也顯示出公學校入學率只不過三成左右時，公學校畢業生對於自己身為受過新教育者的自豪感。事實上，這種自豪感也顯示了臺灣民眾對於公學校教育的期待，希望透過接受新教育得以接近摩登、文明，離開「流汗身體勞動」的傳統生業。

不只是日本人的教育關係者有這種認識，部分臺灣青年也有這樣的觀察：

公學校畢業者，不想幫忙家業的很多。家裡是農家的話，就逃家，一心只想去店裡當學徒（原文為「丁稚奉公」），或到學校或役所找個工友做做。他們的父兄也好，社會也好，都認為與其拿鋤頭、用水牛，不如當個月薪十圓左右的工友，或是做學徒比較好。¹⁸

這樣的言論，顯然受到農村振興運動的影響，主張青年應該回歸農村。但是，另一方

¹⁶ II 生，〈公學校卒業生と社會環境〉，《第一教育》，第 8 期（1929 年 9 月），頁 104-109。

¹⁷ 恭男生，〈公學校卒業生の現狀に對する一考案〉，《臺灣教育》，第 345 期（1931 年 4 月），頁 135-138。

¹⁸ 李朝根（金山青年團），〈健全なる農村青年團の進むべき道（一）〉，《臺灣教育》，第 358 期（1932 年 5 月），頁 78-80。

面，我們也從這裡讀取到一個訊息，亦即到了 1930 年代，未就學人口仍然超過一半，公學校畢業生顯然是同年齡層中的少數，在這種結構中，他們對自己的期待與社會提供的機會，出現了相當的落差。

1922 年新「臺灣教育令」公布後，臺灣逐漸建立起金字塔型的學校體系，小、公學校是最初級的教育階段，必須完成小、公學校教育才能升上上一級的中學校、高等女學校、實業學校、實業補習學校等。在這裡公學校畢業至少有一個重要的意義，即是取得升學的資格。另一方面，社會上有許多職業開始要求學歷。1907 年臺灣總督府公布的「助產婦講習生規程」，參加者要求必須是公學校三年級以上者。¹⁹ 到了 1930 年，臺北市幾位臺灣人醫師，自行創立臺北看護婦產婆講習所，自行訓練產婆，資格限定在小、公學校卒業者。²⁰ 1933 年，臺灣總督府辦理的助產婦產婆講習，參加資格就變成要高等小學校或公學校高等科畢業者。²¹

從戰前到戰後擔任護士的尹喜妹，1928 年自楊梅公學校畢業後，曾短期就讀公學校附設的農業補習學校，心裡雖想升學新竹高等女學校，但家裡不允許，經濟狀況也不好，後來農業補習學校也中輟幫忙家裡農作。1929 年透過親戚幫忙，參加日本紅十字社臺灣支部醫院附設的護士養成所考試。護士養成所分為急救護士和醫院護士兩組，前者是戰地護士，必須高等女學校畢業才能報考；後者只要小學校或公學校高等科畢業即可以報考。雖然尹喜妹農業補習學校沒有畢業，但是還是被允許參加考試，錄取後接受 3 年訓練課程，後來一生以護士為業。由尹喜妹的例子，可以印證公學校畢業不只是升學體系的第一階段，也是許多職業考試要求的基本資格。²²

另一方面，報紙上的求人廣告，也開始增加學歷的要求，例如：

ボーイ募集 年十七、八歳 小、公學校卒業 希望者自筆履歴書持參
卅日午後六時來談 カフエーボタン（1935 年 10 月 30 日）

時計子弟入用 拾四、五、六歳 公學校卒業 臺北市京町正川時計店

¹⁹ 〈助產婦講習生規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7 年 7 月 4 日，版 2。

²⁰ 〈臺北看護婦產婆募集講習生〉，《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30 年 3 月 3 日，版 8。

²¹ 〈看護婦助產婦講習生募集〉，《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33 年 1 月 29 日，版 2。

²² 游鑑明訪問，黃銘明記錄，〈尹喜妹女士訪問紀錄〉，收入游鑑明訪問，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蔡說麗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 年），頁 9-72。

電一四九七 (1939 年 4 月 7 日)

雖然，有寫明學歷要求的廣告不算多，但是這樣的廣告出現，確實也標誌了「學歷時代」的來臨。雖然如同前述公學校教師所言，公學校畢業並無法保證在社會上立刻有效賺錢，但是不可否認的，「公學校畢業」確實在許多方面具有學歷資格的效用，可以藉以參加升學考試或各種職業資格考試，也開始成為部分商場工作的基本學歷要求。

伍、結論

本文考察了大約 1920-1930 年代進入戰爭期之前公學校畢業生在社會上的狀況。

日治中期以後，學校體系逐漸整備，就學人數也逐漸增加，但是一直到 1939 年臺灣學齡兒童的人學率才超過 50%。也就是說，日本統治下大部分的時期，沒有進公學校讀書的人，一直都比有機會進公學校讀書的人還要多。雖然人數不算多數，但是公學校教育為這些畢業生帶來不同的生涯發展。農村中從公學校畢業的人，至少有 20% 的比例日後脫離農業等傳統生業，成為銀行、會社或學校的雇傭人員。到了 1930 年代後期，公學校畢業後想繼續升學的人增加，但中等教育機會沒有相應的成長，因此可以看到有愈來愈多人進入高等科就讀。1938 年，宜蘭公學校畢業生中有一半都進入高等科，而高等科畢業之後，雖然在當時算不上中等學歷，但高等科畢業生「脫農」的機會比本科畢業生更高，甚至成為部分職業的學歷要求。²³

1922 年以後，臺灣總督府在臺灣整備起初等、中等、高等教育體系，要追求學歷，必得從初等教育階段的公學校開始。另一方面，臺灣社會已經相當接受近代學校，也認識到在社會中，學歷是可以證明自己能力的證明書。有學習意欲的臺灣兒童，爭取自己進入近代學校的機會，也透過自己的努力，以公學校為起點，一階一階的取得

²³ 1939 年的臨時國勢調查，有各業種從業者的年齡及教育程度調查，在這份調查中，教育程度僅分成「未達高等小學校及公學校高等科卒業程度者」、「高等小學校及公學校高等科卒業程度以上」、「中等學校卒業程度以上」、「專門學校卒業程度以上」4 種，並未區分未受教育或公學校本科，顯示基本的學歷有往上提升的傾向。臺灣總督府，《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 第一卷 州廳篇 臺北州の部》（臺北：臺灣總督府，1941 年）。

更高學校的入學資格，或是以此學力／學歷為基礎，嘗試正規升學管道以外的學習機會，以便能在社會上有更多發展的可能性。而社會上也逐漸形成以學歷來規範求職門檻，報紙上的求人廣告也開始出現學歷要求，標誌了學歷時代的來臨。

從總督府或教育關係者的立場來看，雖然在 1920 年代以後不得不整備中高等教育，但是他們的預想是大部分的臺灣人只要公學校畢業即可投入職場，期待大部分人受過公學校教育以後，回到農村成為能夠以科學、合理方式耕作的農民，以振興地方。但是，對受了初等教育的臺灣人來說，可能很多人正是想藉此擺脫農民的位置，在此，我們會注意到 1930 年代以後逐漸普及的公學校高等科以及實業補習學校的意義。²⁴

本文僅就 1930 年代前後的統計數字、個人經歷及教育雜誌等報導，做初步的考察。未來將進一步分析報紙求人廣告及各種資格考試的學歷要求，進一步分析學歷在臺灣社會史中的意義。

²⁴ 參考許佩賢，〈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6 期（2013 年 12 月），頁 101-148。

附表 1、宜蘭郡公學校本科及高等科兒童畢業後狀況統計表

年度	總數	修上級教科者	總數	中學校	高女	農業學校	工業學校	高校尋常	師範學校	商業學校	實業補校	私立學校	總數	農業	水產業	礦業	工業	商業	交通業 1933 銀行會社 員	公務自 由業 1933 官 公吏雇 備人	其他 有業 者	家事 使用 人	無職 不詳 死亡
1926	322 113	38 11	13 1	3 0	0 1	9 0	--	-	1	-	-	-	254 41	148 12	10 -	-	6 12	38 5	-	10 4	16 6	26 2	17 60
1927	281 78	42 17	9 3	0	3	7	-	-	1	-	-	1	222 58	87 11	8	18	2	26 1	0	11 1	28 4	42 41	32 16
1928	344 114	41 15	21 3	10	-	5			1			5	260 94	111 5	4		14 2	29 3	1	21 3	10 4	70 74	22 2
1929	404 116	11 12	26 2	2	-	15						9	309 96	130 7	8		5 2	24 3	2	38 3	12 1	90 80	16 0
1930	387 125	48 23	16 5	2	-	6	-	-	1	-	-	7	310 97	142 2	3	-	6 -	58 2	5	21 3	14 8	61 81	13 -
1931	399 117	44 26	24 1	5	-	17	-	-	2	-	-	-	323 87	171 44	9	-	4 -	109 36	2	23 -	5 4	-	8 3
1932	443 138	82 35	9 2	3	-	5	-	-	-	-	-	1	323 26	214 16	2	-	9 1	44 2	4	20 3	13 3	17 1	29 75
1933	412 150	83 23	16 3	4	-	12	-	-	-	-	-	-	309 133	172 22	9	-	6 -	25 4	-	20 4	2 -	75 103	4 -
1934	421 185	68 37	26 2	5	-	19	-	-	-	-	-	2	299 43	151 31	4	-	- 6	26 1	-	33 6	8 1	77 98	28 3
1935	467 201	62 38	29 3	6	-	20	-	-	-	-	-	3	345 146	115 13	5	-	5 -	25 6	-	25 9	6 7	164 111	31 14
1936	448 233	115 63	46 22	9	-	23	6	-	1	6	-	1	284 148	94 20	-	-	- 5	48 5	-	54 20	1 4	87 99	3 -
1937	570 230	114 67	16 8	4	-	12	-	-	-	-	-	-	340 155	100 50	-	-	1 1	46 26	-	50 6	8 6	135 66	- -
1938	542 259	232 81	29 22	5	-	21	-	-	-	-	-	3	269 156	87 12	-	-	1 -	3 -	-	31 9	1 6	146 129	12 -
1939	737 358	230 95	30 36	3	-	23	-	-	-	1	-	3	460 210	181 37	8	1	3 -	12 1	-	38 24	10 19	207 129	17 17
1940	374 96	113 40	11 3	-	-	3	-	-	-	-	-	5	525 252	296 148	1	5	50 15	65	-	9 5	46 18	53 22	- 3

說明：各年度人數第一列為男，第二列為女。

資料來源：各年度《臺北州統計書》。

徵引書目

一、史料彙編

臺北州官房文書課，《昭和九年 臺北州統計書》。臺北：臺北州知事官房文書課，1936年。

臺灣總督府，《臨時國勢調查結果表 第1卷 州廳篇 臺北州の部》。臺北：臺灣總督府，1941年。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二十七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1年。

臺灣總督府文教局，《臺灣總督府學事第三十三年報》。臺北：臺灣總督府文教局，1936年。

二、報紙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7、1933年。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臺北，1930年。

三、專書

佐藤（粒來）香，《社会移動の歴史社会学——生業／職業／学校》。東京：東洋館出版社，2004年。

吳文星，《日據時期臺灣社會領導階層之研究》。臺北：正中書局，1992年。

宜蘭公學校，《臺北州宜蘭公學校創立四拾周年紀念誌》。臺北：宜蘭公學校，1939年。

洪四川，《八十四述——洪四川自傳》。高雄：洪四川文教公益基金會，2001年。

游鑑明訪問，吳美慧、張茂霖、黃銘明、蔡說麗記錄，《走過兩個時代的臺灣職業婦女訪問紀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1年三刷。

臺灣總督府，《臺灣統治概要》。臺北：臺灣總督府，1945年。

鄭鴻生，《母親的六十年洋裁歲月》。臺北：印刻出版社，2010年。

四、期刊論文

- JI 生，〈公學校卒業生と社會環境〉，《第一教育》，第 8 期（1929 年 9 月）。
- JI 生，〈公學校卒業生と社會環境（二）〉，《第一教育》，第 9 期（1929 年 10 月）。
- 李朝根（金山青年團），〈健全なる農村青年團の進むべき道（一）〉，《臺灣教育》，第 358 期（1932 年 5 月）。
- 恭男生，〈公學校卒業生の現狀に對する一考案〉，《臺灣教育》，第 345 期（1931 年 4 月）。
- 許佩賢，〈日治時期臺灣的實業補習學校〉，《師大臺灣史學報》，第 6 期（2013 年 12 月）。